

MING JIA SHU FU ZUO PIN JI

文海藝術出版社

主編 孫旭光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出品

BAI FU JU ZHEN 百福具臻名家書福作品集

MING JIA SHU FU ZUO PIN JI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主编 孙旭光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出品

BAI FU JU ZHEN 百福具臻 名家书福作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福具臻名家书福作品集 / 孙旭光主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39-5082-7

I. ①百… II. ①孙…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6514号

百福具臻名家书福作品集

编 著：孙旭光

责任编辑：吴士新

装帧设计：李 穆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箱：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 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11.5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39-5082-7

定 价：128.00 元

目录

前言	03	崔东胥	56
恭王府与“福”文化	06	李宝林	58
李岚清	12	杨力舟	60
王汉斌	14	苗再新	62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16	苗再新	64
吕章申	18	赵俊生	65
冯远	20	赵俊生	66
潘公凯	22	马硕山	68
尼玛泽仁	24	马硕山	70
尼玛泽仁	25	王迎春	71
魏传义	26	谢志高	72
魏传义	28	张立柱	74
马国强	30	张立柱	76
肖舜之	32	肖文飞	78
马书林	34	肖文飞	80
马书林	36	董继宁	81
满维起	37	董继宁	82
邵大箴	38	姚舜熙	84
杜滋龄	40	姚舜熙	85
郎绍君	42	李延声	86
梅墨生	44	吴冠南	87
梅墨生	46	华其敏	88
刘曦林	48	华其敏	90
申少君	50	卓鹤君	92
李晓松	52	卓鹤君	93
李晓松	54	孔维克	94

邢庆仁	96	梁江	140
刘进安	98	洪惠镇	142
卢禹舜	99	于志学	144
徐福山	100	张鸿飞	146
魏广君	102	贾广健	148
魏广君	104	刘万鸣	148
曾来德	106	武艺	150
石齐	108	陈平	152
邓远坡	110	贾平西	154
曾翔	112	张公者	156
高卉民	114	陈鹏	158
高卉民	116	赵宁安	160
何加林	118	何水法	162
何加林	120	李洋	164
杜大恺	121	纪连彬	164
赵卫	122	刘罡	166
赵卫	123	解永全	168
李晓军	124	王珂	170
崔晓东	126	孙伯翔	172
李乃宙	128	李岗	174
吴山明	130	崔进	176
施大畏	132	李魁正	177
陈海良	134	丁立人	178
杨涛	135		
贾浩义	136		
李一	138		

MING JIA SHU FU ZUO PIN JI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主编 孙旭光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出品

BAI FU JU ZHEN 百福具臻 名家书福作品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百福具臻名家书福作品集 / 孙旭光主编.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39-5082-7

I. ①百… II. ①孙…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6514号

百福具臻名家书福作品集

编 著：孙旭光

责任编辑：吴士新

装帧设计：李 穆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箱：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 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11.5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39-5082-7

定 价：128.00元

前 言

“福”字在甲骨文中即已存在，它是吉祥之首，涵盖了生活中美与善的各个方面。随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变迁与发展，“福”的文化内涵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演变成中华民族的生活观念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民众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美好期盼。在春节这个最具传统文化氛围的节日，恭王府邀请了百位名家，携手书“福”，阐释他们对“福文化”的理解。这次活动不仅得到书画界名家的积极响应，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等同志听说之后，也都欣然挥毫，表达自己对祖国昌盛、民族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美好祝愿。

中国人自古就有祈福、盼福、崇福、尚福的心理。恭王府花园因其独一无二的“康熙御笔福字碑”和随处可见的蝙蝠形建筑装饰，在民间素有“万福园”之称。络绎不绝的游人前来恭王府参观，不仅因为它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内涵，往往也是出于对“福”的崇敬和向往。这座现存最完整的清代王府如今已被视为王府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联系皇家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纽带。在祈福风尚最盛的明清两代，“福”文化是当时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民间美术到宫廷书画无不表现出祥瑞题材的极大繁荣。恭王府的建筑、景观、花木以至府主人的翰墨诗赋，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尚。

名家书“福”，以诗意的语言和书法的艺术形式表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精神追求。这些艺术作品与恭王府秀丽祥和的景致情境交融，反映出“福”文化在惯常的喧闹喜庆之外独有的谦逊和谐之美。

孙其文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目录

前言	03	崔东胥	56
恭王府与“福”文化	06	李宝林	58
李嵒清	12	杨力舟	60
王汉斌	14	苗再新	62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	16	苗再新	64
吕章申	18	赵俊生	65
冯远	20	赵俊生	66
潘公凯	22	马硕山	68
尼玛泽仁	24	马硕山	70
尼玛泽仁	25	王迎春	71
魏传义	26	谢志高	72
魏传义	28	张立柱	74
马国强	30	张立柱	76
肖舜之	32	肖文飞	78
马书林	34	肖文飞	80
马书林	36	董继宁	81
满维起	37	董继宁	82
邵大箴	38	姚舜熙	84
杜滋龄	40	姚舜熙	85
郎绍君	42	李延声	86
梅墨生	44	吴冠南	87
梅墨生	46	华其敏	88
刘曦林	48	华其敏	90
申少君	50	卓鹤君	92
李晓松	52	卓鹤君	93
李晓松	54	孔维克	94

邢庆仁	96	梁江	140
刘进安	98	洪惠镇	142
卢禹舜	99	于志学	144
徐福山	100	张鸿飞	146
魏广君	102	贾广健	148
魏广君	104	刘万鸣	148
曾来德	106	武艺	150
石齐	108	陈平	152
邓远坡	110	贾平西	154
曾翔	112	张公者	156
高卉民	114	陈鹏	158
高卉民	116	赵宁安	160
何加林	118	何水法	162
何加林	120	李洋	164
杜大恺	121	纪连彬	164
赵卫	122	刘罡	166
赵卫	123	解永全	168
李晓军	124	王珂	170
崔晓东	126	孙伯翔	172
李乃宙	128	李岗	174
吴山明	130	崔进	176
施大畏	132	李魁正	177
陈海良	134	丁立人	178
杨涛	135		
贾浩义	136		
李一	138		

恭王府与“福”文化

恭王府位于北京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地区，是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且唯一对公众开放的一座。这里最初是乾隆帝宠臣大学士和珅的宅邸，同时也是其儿媳、乾隆帝幼女和孝公主的府邸；和珅获罪后，嘉庆帝将和珅住宅部分赐予庆王永璘居住，直至和孝公主去世，整个建筑归属庆王府。咸丰帝即位后，又将庆王府收回转赐其弟恭亲王奕訢，自此称为“恭王府”。恭王府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府邸由东、中、西三路多进四合院组成，建筑规整宏大；花园名“萃锦园”，融江南园林艺术与北方建筑格局为一体，充分显示了满清王族园林华丽而不失别致典雅的风格。

恭王府的建筑迎合明清时期盛行的祈福风尚，在形制、装饰等方面都体现出福瑞吉祥的寓意。尤其花园“萃锦园”的设计，以“福”为中心，以诗为布局，直白处一目了然，含蓄处意境深远，秀丽与凝重并存，反映着主人高雅的审美情趣，也表达出祈愿阖家平安、幸福团圆的强烈愿望。

萃锦园坐北朝南，正门在南面正中。与府邸建筑相呼应，园中建筑也约略形成中、东、西三路轴线，以“福”贯穿中轴。中路正门内是一长形直立的湖石，顶部刻“独乐峰”；其后为一蝙蝠形水池，名“蝠池”，旧称“福河”；蝠池之北是安善堂，再后便是花园的核心——康熙御笔福字碑，嵌于花园主峰下的秘云洞中；山后是中路最后一组厅房，形制奇特亦如张开双翼的蝙蝠，因此被称为“蝠厅”。蝠厅、福字碑、蝠池以及府邸后罩楼上“福庆有余”的花窗连成一线，使“福”的主题一路贯穿。

“福”字碑

恭王府花园在民间素有“万福园”之称。据说园中各处装饰的蝙蝠，只可以数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寓意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福”。只有加上康熙御笔福字碑上的那个“福”，方为圆满，才敢说“万福”。

“福”字碑所在的花园主峰是一组湖石假山。假山叠石成龛形，东西各埋一口水缸，缸下有一小孔。旧时，夏秋两季蓄水于缸内，水顺小孔渗入石壁，使石壁间遍生青苔，苍翠欲滴，此山即名“滴翠岩”。岩下正中有洞名“秘云洞”，两翼伸向东西，略具蝙蝠形，洞内“峭石倒垂，曲折深邃。洞深处凿石为磴，盘旋可至岩上，云窦零芬，苔痕晕翠……”^①，颇有些“洞天福地”的感觉。康熙御笔福字碑就镶嵌在洞内正中的石壁上。碑高129厘米，宽54厘米，厚14厘米。正面镌一草书“福”字，正中上方钤“康熙御笔之宝”印，是花园中路的灵魂焦点，有福照全园之意。

“福”字考

“福”，形声，从示，“畐”声，声符亦兼表字义。“畐”是一个象形字，上半部像人首，“田”像腹部之形；腹中的“十”，表示充满之义，所以“畐”有腹满的意思。“福”、“富”互训，表明家富则有福。据《尔雅·释诂》记述，“福禄”二字，若散文则禄即是福，故《诗经》中“天被尔禄”一句的注释说：“禄，福也。”若对文则禄福义别，故“福禄如茨”一句注解为：“爵命为福，赏赐为禄。”也就是说，“福”是富贵之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福”字的意思，在“富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韩非子·解老》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礼记·祭统》：“福，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可以说，“福”就是万事如意，是人生的理想状态，是人们对于生活最美好的愿望。

在古代用法中，“福”字还指祭祀用的酒肉，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性特色。人们向天、神奉献祭品，祈求天、神保佑诸事顺意。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福”的本义解释为：“福，祐也。”指天、神等的佑助。人力毕竟有限，有了上天的保佑、诸神的庇护，“福”似乎更加可望可及；人们祈福的心愿也因而有所寄托，找到了表达的途径，形成了“天降洪福”、“天官赐福”等等说法，表明“平安五福自天来”。

“五福”的说法显示出“福”字含义的广泛。据《尚书·洪范》载，所谓“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可见，有“富贵”未必就有“福”，纵是帝王公侯之家，也难得“五福俱全”。只有长寿、富贵、健康安乐、有德行，且能寿终正寝的人，才称得上是有福之人。这其中，“寿”居五福之先，是五福的核心，常见的“五福捧寿”的图案即由此而来。“考终命”被认为最难实现，《康熙政要》云：“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而五福的根本则是“攸好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民间传说或是宗教故事，多劝人积德行善，以求心安理得，知足常乐。自诩“诸福具备”的乾隆帝，曾写《五福颂》阐述其对五福的见解：“余以为寿、

富、康宁及考终命，皆受之于天，而好德则修之于人……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品德是福的基础，是五福中唯一不靠天赐而靠自身培养的。品德高尚就会有福。

“五福”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的理解，表达了人们希望人生完美而终的美好愿望。可以说，“福”是吉祥之首。一个“福”字，涵盖了生活中美与善的各个方面。

写“福”、贴“福”的由来

与“寿”或“禄”不同的是，“福”因为涵盖一切反而成为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在表现方式上也让人有无从下笔的茫然。比如“寿”，有脑门隆起，皓髯垂胸，慈眉善目，手托蟠桃的寿星老；禄星必然身着蟒袍玉带，手捧牙笏；财神的形象虽然多样，但无论文官武将还是童子打扮，手中必然捧着元宝或铜钱。唯有福星，既没有极具说服力的形象，也没有特别醒目的标志，通常扮作白胖员外出场，还要不辞辛苦地为自己打出“天官赐福”的条幅，或麻烦身边跟随的童子代劳。远不如寿星、禄星或财神那样形象鲜明，让人一望便知。既然反正要靠文字说明，不如索性只写一个“福”字更简单明了。

有民俗学家认为，写“福”字、贴“福”字的做法，可能从贴春联演变而来。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古人在三十在桃木板上写字挂在门旁，表示求吉迎春之意，五代以后渐成春节的一项习俗。《宋史·蜀世家》载：（公元964年，后蜀主）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为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载入史籍的最早的一副春联。

春联流行于明代。据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下令公卿王侯及平民百姓家，过年“悉加春联，帝(朱元璋)征行出观以为乐”。又因古代传说，春节出来伤人的猛兽“年”惧怕红色，故采用红纸写对联。满族人很早就接受了这种习俗。据清人杨宾的《柳边纪略》记载，东北地区的满族，“岁除必贴红纸春联，联贵四六”。² 满族春联的内容多以迎春，求吉利、富贵为主要内容。春联之外还有春条，最少四个字，如“出门见喜”、“四季平安”等，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另有“斗方”，多贴于家具、影壁，内容不像春联那样时效性强。贴在影壁上的如“五福临门”，卧室内的如“身卧福地”等。斗方的字数没有限制，写一个字自然也可以。写福、贴福可能就是受了“斗方”的启发。

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写“福”字、贴“福”字的习惯多认为源于清帝赐福字给大臣的习俗。³ 清代自康熙以后，每年入冬，皇帝都要亲自书写“福”、“寿”字，颁赐给后妃、近侍、近支王公和内外大臣。据嘉庆年间成书的《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宫中事例”记载：康熙年间，偶蒙亲书“福”字颁赐臣工，至雍正时遂著为成例。康熙帝当年用来写“福”字的笔叫“赐福苍生笔”，被当作“吉祥法物”珍藏起来。乾隆十一年（1746），位于今北海公园的阐福寺落成，以后每年腊月初一乾隆帝都先去拈香，“冀资佛力，善福苍生”；还宫后，开笔书“福”字。据昭梿《啸亭杂录》记载：“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篆，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翼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

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光绪帝亲政前，慈禧以太后身份秉政，每年入冬后也在长春宫用康熙帝的“赐福苍生笔”写“福”字。书“福”颁赐作为宫中的成例，一直延续到溥仪被逐出宫。

受赐“福”字的王公大臣，都会将之恭悬于厅堂之上。恭王府东路建筑多福轩即为恭亲王家族悬挂御赐“福”“寿”字之处。多福轩在恭亲王奕訢时期被用作奕訢的私人客厅，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可以知道，当时殿内挂满慈禧太后、光绪帝等御笔亲赐的“福”字和“寿”字。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造办处活计档可以查到，粘贴这些“福”“寿”字的匾额均由故宫造办处承制，大小形制皆有记载。在奕訢所著《乐道堂文钞》、《萃锦吟》以及其子贝勒载滢所著《雍熙雅颂》、《云林书屋诗集》中也都能找到关于受赏“福”“寿”字情况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出恭亲王家族在当时显赫的地位，同时也可以发现，书“福”颁赐的做法已不仅限于春节前后，而逐渐成为清宫笼络人心的常态行为。现在，多福轩已根据史料记载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复原，再现了当年福寿满堂的景象。

天下第一福

据说，在清帝书写的所有福字中，最珍贵的就是恭王府花园中康熙御笔福字碑上的那个“福”字，被誉为“天下第一福”。

传说康熙十二年（1673），祖母孝庄皇太后六十大寿将至，却突染重病，太医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时，康熙帝查知上古有“承帝事”请福续寿之说，意思是真命天子是

万福之人，可以向天父为人“请福续寿”，遂决定为祖请福。沐浴斋戒三日之后，一气呵成了这幅“福寿”联体的“福”字，并在正中上方加盖“康熙御笔之宝”印玺，取意“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太后自得此“福”字，百病全消，十五年后以七十五岁高龄得以善终。民间称这是康熙“请福续寿”带来的福缘。更有人将这个“福”字解释为集“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于一体，可谓涵盖了“福”所代表的全部意义。事后康熙几番重提御笔，却再也写不出其中的神韵，所以民间盛传此福为“天赐鸿福”。

至于此碑缘何安放在恭王府的花园中，至今尚无确切解释。一些专家将其作为府园修建于和珅入住之前的依据之一，理由是在清代，对康熙帝所赐“福”字的刻石，是不会有人敢随意摹刻、假冒、搬动和私自接受的。所以，在和珅入住之前这里应该已经是某位王公大臣的府宅或寺庙了。不过一般还是认为，康熙御笔“福”字碑和府园中其他一些清初遗物一样，都是不与土木相连，可随时移动的东西，以和珅或奕訢的身份，能够得到它们也并非难事，因而不能作为判断王府修建年代的依据。

蝠池与蝠厅

花园中路的蝠池由青石围砌而成，东西边缘宛若蝙蝠双翅向外展开，故名“蝠池”；又因其形似元宝，也叫“元宝池”。池周围有榆树环绕，“蝠”“榆”与“福”“余”谐音，且榆树的果实形似铜钱，春天榆钱纷纷落入池中，营造出一派书香富贵的景象。

蝠厅是花园中路最后的建筑，正厅五间，硬山卷棚顶，前后各出三间歇山顶抱厦，正厅两侧各接出三间折曲形的耳房，与正厅相接处为硬山顶，折曲处为庑殿顶，两端为歇山顶，周围均出廊，形制特殊多变，如蝙蝠之两翼，因得名“蝠殿”，又称“蝠厅”、“福厅”，旧时王府中人称“蝠房子”。

蝠池与蝠厅是建筑和园林设计中匠心独具的作品。设计者利用蝙蝠的“蝠”与“福”同音的特点，巧妙构思，达到了使园中中路建筑与“福”字碑头尾呼应的效果。

蝙蝠考

蝙蝠，《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哺乳动物，头部和躯干像老鼠，四肢和尾部之间有皮质的膜，夜间在空中飞翔，吃蚊、蛾等昆虫。视力很弱，靠本身发出的超声波来引导飞行。”它在动物学中属哺乳类翼手目，是唯一真正有翅膀，能飞翔的哺乳动物，飞行时速可高达100公里。蝙蝠的外形有如长了翅膀的老鼠，传说其本为老鼠，因为吃了盐才变成现在的丑怪模样，所以蝙蝠又有“飞鼠”或“仙鼠”之称。

蝙蝠倒悬于洞中，昼伏夜出，这种奇特的习性令古人感到神异，因而视之为长寿之物，认为食之可延年益寿。《抱朴子》云：“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太平御览》引《水经》：“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尝测其远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鸟，多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蝙蝠怪异的外形和习性还被古人用来“以恶制恶”，成为驱邪避祸，引来福音的象征。神话传说蝙蝠昼伏夜出，能识鬼魅藏身之

所，飞随钟馗辅助捉鬼除魔。按照《平鬼传》的说法，门神神荼摇身变为一只蝙蝠在前引路，郁垒则化为一把锋利的宝剑助钟馗斩妖除魔。蝙蝠因其益寿与驱邪的不同功用，又可分为黑白两种。据《历代神仙通鉴》载：天地混沌初开时，即有黑白蝙蝠，白蝙蝠是八仙中倒骑驴的张果老，黑蝙蝠则是捉鬼吃鬼的钟馗。

无论如何，蝙蝠本身并没有什么自然特性显示出富贵平安等“福”的征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图案纹样中应用极为广泛的吉祥物，主要还是蝙蝠的“蝠”与“福”同音的缘故。这种发音上的相似，使蝙蝠的一切怪异之处都具有了吉祥的寓意：蝙蝠会飞，即“福从天降”；蝙蝠喜成群聚集，喻意“多福”；蝙蝠倒悬，是为“福到了”——天生蝙蝠，仿佛就是为了给中国人颇费踌躇的“福”代言的。蝙蝠意义如此重大，历朝历代的艺人们自然不敢怠慢，经过不断的夸张、提炼、变形等艺术化处理，蝙蝠一改丑陋面貌，成为具有丰富造型的艺术装饰形象。民间有画蝙蝠的口诀云：“蝙蝠从来形不拘，如龙似虎方称奇；虎头云耳身似鼠，两翅斜飞有高低。”

恭王府中的蝙蝠装饰

萃锦园有“三多”：一是游廊多，即便下雨天也可以通过游廊游览全园；二是榆树多；三是“蝠”多。仅花园长廊，上到楣子、花牙子，下至座凳栏杆，就雕刻了数千只蝙蝠。其他凡开敞式建筑，如方塘水榭、秋水山房，其檐枋和栏杆的装饰亦是如此。有趣的是，大戏楼内部梁枋上的楣子与花牙子，以及戏台周围的栏杆，也都装饰着与戏楼外回廊

一样的木雕蝙蝠。这可能是为了表示戏楼是设在藤萝架下，而并非真的在室内。因为即使是故宫、颐和园的戏楼也不是全封闭的，奕訢看戏自然不敢比慈禧太后更舒服，所以虽在室内，却布置得与敞厅无异。

此外，在花园中路主要建筑安善堂的前抱厦，大戏楼外的回廊以及西南土山脚下的秋水山房，梁枋之上皆绘满金色蝙蝠图案，富丽堂皇。园中凡是屋檐有两重椽子的建筑，如蝠厅、安善堂、秋水山房等，椽子上的图案必为上层“卍”字，下层口衔寿桃、身体倒挂的红蝠，意喻“天降洪福”与“福寿万年”。

福生于微

在恭王府，祈求福佑的心思可谓无微不至。府邸中最有特点的，当属后罩楼的什锦窗。后罩楼紧挨花园，有两层，长160余米，贯穿50余间，规模宏大，十分罕见。后檐墙上每间上下层各开一窗，下层均为长方形窗，上层则是形式各异的什锦窗，窗口有圆形、方形、桃形、石榴、卷书、银锭、“福庆有余”等形式，其上砖雕更是细致精美，寓意吉祥。如，以蝙蝠及卷云纹构成的“福运绵绵”，以古朴的回纹与环纹寓意“长盛不衰”，以绶带鸟颂祝长寿；以“石榴”式窗配缠枝莲图案的雕刻，取石榴“多子”与缠枝莲“连绵不绝”之意；在“桃”形窗上雕刻祥云、蝙蝠、“卍”字及绶带，象征“福运绵绵，万福万寿”，等等。

府园中绚丽的彩画也反映着主人祈求福寿安乐的愿望。除了“事事如意”、“宝相花”等常见的祥瑞题材的苏式彩画外，在对府邸进行全面修缮的过程中，还在中路神殿嘉乐

堂的天花内发现了具有震慑恶邪寓意的二龙戏珠和阴阳八卦彩画，以及绘有梵文和暗八仙的彩画，构图舒展、形象生动、寓意吉祥。东路多福轩的屋顶楣井天花，内中圆形图案名“玉堂富贵”，以玉兰花、海棠花和大朵牡丹花构成，色彩艳丽而不失清雅。西路葆光室的天花为旋花图案的旋子彩画，所绘皆祥花瑞草，图案别致，博彩古雅，是清代彩画中罕见的佳作。葆光室后檐天花内还发现了红蝠流云碎花皮球包袱式苏式彩画，具有极明显的清中期特征，应为和珅时期所绘，目前尚未在其他地方发现。

王府祈福的社会背景

中国人自古就有祈福、盼福、崇福、尚福的心理，从吉祥图案的发展演变上可以看出，明清两代，人们的祈福心理尤其强烈。此时是吉祥纹样发展的盛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祈福更是清代旗人的一大特点。满族人入关以后，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自然希望安逸的生活能够长久。生活在北京的旗人，每月按时领到国家发的钱粮，多数都能过上小康生活。“饱暖生闲事”，历来讲究规矩礼数的旗人自然有闲情与热情将各种祈福迎祥的规矩发展到极至。

在这种环境下，旗人中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一般都很迷信。据说，康熙帝晚年因几位皇子争夺皇位而苦恼，最担心的就是不能“考终命”，做不了“五福俱全”之人。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曾提到，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自命是个不迷信的人，曾把一只被仆妇、丫环认为是仙家的大刺猬一脚踢到花园的小河内。但是，如果孩子们

将正月初五他生日那天按惯例称为“破五”时，他也会不高兴地订正道：“不，福寿五！”¹

另一方面，与民间祈求“福、禄、寿”不同的是，王室贵族不求高官厚禄，唯盼福寿双全。比如恭王府两位最主要的主人——和珅和奕訢，一个入住时已是官高爵显，另一个生就是龙子龙孙，高官厚禄显然都不是问题，因此“福寿”就成为主要的追求。这从恭王府内各种与“福”相关的标志中便可看到。清代的帝王大都关心翰墨，因而才有了“书福颁赐”这样儒雅的祈福、赐福活动。这种风尚也被皇子皇孙带入王府，使得恭王府的“福”文化更多了一份清雅含蓄的内涵。

张艾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展览陈列部

- 1、恭亲王奕訢次子贝勒载滢：《补题邸园二十景》，《云林书屋诗集》卷二。
- 2、参见刁书仁编著：《满族生活掠影》，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第39、40页。
- 3、此部分内容主要参考左步青：《书“福”颁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第35、36、37页。
- 4、溥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255页。

尺寸：65cm×38cm
释文：福在中华文化中有诸多意义。
余以为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乃至福也。
印文：福，国泰民安，庚寅，李岚清。
作者：李岚清